

明代皇帝服饰上的“华虫”考释*

杨妍均 陈芳¹⁾

内容提要 “华虫”为十二章纹之一，饰于帝王最高等级之服饰。作者从博物学视角，探究了“华虫”在明代皇帝玄衣、衮服上的使用情况与造型变化。同时对“华虫”原型进行考释，追溯了其原型为环颈雉、而后变为白腹锦鸡、最后定型为红腹锦鸡的过程，并对“华虫”象征涵义的演变进行梳理。

关键词 华虫 玄衣 衮服 博物学 环颈雉 红腹锦鸡

关于服饰上的十二章纹，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从制度层面展开讨论，较少深入研究具体的章纹。本文以十二章纹中的“华虫”为例²⁾，在博物学视野下考察明代皇帝服饰上“华虫”的使用情况与造型变化，对其物种进行溯源，厘清“华虫”原型从环颈雉到白腹锦鸡，再到红腹锦鸡的演变轨迹，考证其涵义由耿介之意变为炳蔚之文，并象征帝王文明之性的发展历程。

一 明代皇帝服饰上的“华虫”

“华虫”最早见于《尚书》：“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绋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³⁾至于“华虫”乃至十二章纹的知识生成与最早的使用时间，学界并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十二章纹的全面使用是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尚书》十二章纹之言为后人窜入。东汉时明帝沿袭此服制，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需求十二章纹成为定制⁴⁾。至明代，皇帝服饰上的十二章纹制度已较为完备，但不同时期仍存有变化，如其中“华虫”纹样就经历了造型、位置及数量等方面的改变，但已经非常完备。从文献来看，“华虫”作为礼仪性纹样，饰于皇帝玄衣，皇帝祭天地、宗庙时，以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明代军戎服饰研究”(项目编号: Z1BG11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项目编号: 23NDJC230YB)的阶段性成果。

1) 陈芳系本文通讯作者，电子邮箱: ariesjun@qq.com。

2) 本文所述“华虫”为“华虫”纹样，为行文爽利简称“华虫”。

3) 《尚书·虞书》，中华书局，2021年，第43页。

4) 参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31、382页。

〔图一〕洪武年定皇帝玄衣正面

上图:明洪武年冠服图 采自《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
下图:明洪武冠服线图 采自《大明集礼》卷四〇《冠服》,嘉靖九年刊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场合皆着玄衣^{〔1〕};从出土实物与传世画像来看,“华虫”还饰于皇帝衮服。下面主要对明代皇帝玄衣和衮服上的“华虫”进行分析。

1. 玄衣

洪武朝、永乐朝和嘉靖朝都曾规定玄衣章纹制度,结合《明宫冠服仪仗图》《大明集礼》和《大明会典》,可梳理出“华虫”在这三朝玄衣上的使用情况。

其一,洪武规制。洪武十六年(1383)定:皇帝“衮,玄衣黄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织在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绣在裳”^{〔2〕}。《明宫冠服仪仗图》《大明集礼》中绘有洪武年定皇帝玄衣图,其上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章纹,与上述文献资料相符〔图一〕。其中,日、月、星辰、山饰在肩,龙、华虫饰在袖。龙为行龙,一升一降;“华虫”每袖一枚,位于行龙之下。但遗憾的是,仅见玄衣正面图,不知其背面章纹情况。

其二,永乐规制。据《大明会典》记载,永乐三年(1405)定:皇帝“玄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3〕}。《明宫冠服仪仗图》载有永乐年定皇帝玄衣图〔图二〕,所示玄衣与《大明会典》记载相符。与前朝相比,永乐制玄衣改动较大,章纹种类、位置、数量皆有变化。首先,此时

玄衣增加了火、宗彝两种章纹。其次,星、山从肩部移至身背,龙纹由行龙变为团龙且移至肩部,因而玄衣袖部得以腾出空间饰火、华虫和宗彝。此外,玄衣的主要章纹移至背面,正面除肩部外没有其他纹样。就“华虫”而言,此时“华虫”数量每袖增至三枚,装饰位置由袖子的底部移至中端,且单个纹样的面积有所减小。

其三,嘉靖规制。嘉靖八年(1529)定:玄衣“凡织六章,日月在肩,各径五寸,星山在后,龙、华虫

〔1〕 《大明会典》卷六〇,《续修四库全书》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6页。

〔2〕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第196页。

〔3〕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第1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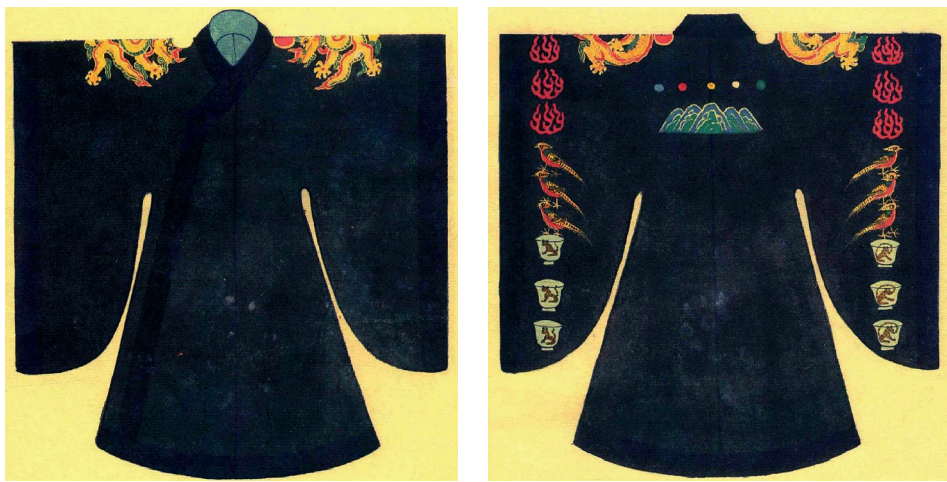
在两袖，长不掩裳之六章”¹⁾。

《大明会典》所附玄衣图〔图三〕，其章纹种类与位置符合嘉靖制玄衣，图中玄衣身长减短也呼应了“长不掩裳之六章”之规定，因而〔图三〕所绘玄衣为嘉靖八年改制后的玄衣。嘉靖制玄衣综合了洪武和永乐玄衣的特征，还原了洪武时期玄衣章纹的种类，减去了火、宗彝两种章纹，将团龙改回为行龙，但皆为升龙，“华虫”的位置也回归至洪武时期，数量沿用了永乐制即每袖三枚。同时，主要章纹仍饰在身背，与永乐制同，只是“华虫”脚下加饰了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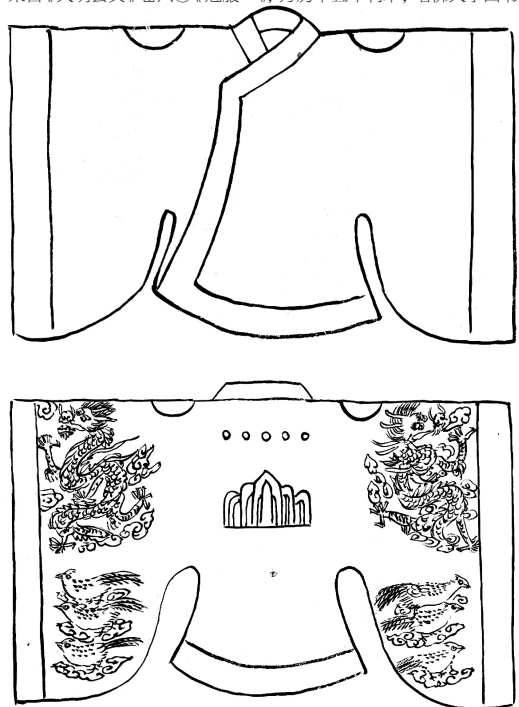
上述三次玄衣改制对章纹数量、位置等内容皆有调整，“华虫”也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变化，洪武制“华虫”饰于正面袖子下端且每袖一枚；永乐以后“华虫”改饰于背面，数量增至每袖三枚，位置移至袖子中端；而嘉靖朝“华虫”的位置又回归至袖子下端。若想明确“华虫”位置变化的内因，需要将其置于明代服制背景下进行讨论。

明代服制自草创之时共有三次规模较大的变革，分别在洪武朝、永乐朝和嘉靖朝，玄衣改制正是由此而来。这三次服制变革的主要目的是重塑秩序，强化帝王统治的正统性。明初百废待兴，朱元璋为恢复礼制、稳定社会秩序创建了明代服制，洪武三年七月《明太祖实录》载：“古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²⁾又洪武二十八年载：“朕自即位以来，累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着为条格。”³⁾可见朱元璋对服制重塑秩序的重视。朱元璋驾崩后，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但燕王朱棣夺权称帝，改年号为“永

〔图二〕永乐年定皇帝玄衣正面与背面
采自《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明永乐年冠服图



〔图三〕嘉靖年定皇帝玄衣正面与背面图样
采自《大明会典》卷六〇《冠服一》，万历十五年刊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1)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第198页。

2)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原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076页。

3) 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三，第3529页。

【图四】南宋陆信忠《地藏十王图》(局部)

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采自《宋画全集》第七卷，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乐”。而后，永乐帝为重塑帝位合法性，推行变革庙制、迁都北京等一系列举措^①，修改明代服制亦有此意。嘉靖皇帝系皇室旁支继承皇位其正统性也存在问题，故即位时掀起了“大礼仪之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实则蕴涵着皇权与阁权的政治斗争。在此背景下，嘉靖八年皇帝以恢复祖制之名，对明代服制进行改制。

服制改革的目的是重塑秩序、强化帝王统治的正统性，所以三朝服制修改皆以恢复礼制为由。而皇帝冕服在明代服饰中等级最高，是塑造新秩序的典型代表，因此每次服制改革都调整了玄衣形制。分析了服制改革的内因后，再看玄衣章纹变化的

具体依据。明代以前玄衣基本饰八种章纹，但明初朱元璋“命儒臣历考旧章”后定冕服玄衣六章，其依据大约来自郑玄注《尚书》曰：“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此绣与绘各有六，衣用绘，裳用绣。”^②章纹位置可能与宋画《十王图》有一定关联〔图四〕，《十王图》中部分王所着服饰绘有十二章纹，但由于王坐于桌案之后，仅可见肩部和袖部的日、月、星辰、山、龙五种章纹。而这五种章纹的位置与洪武制玄衣相近，所以推断二者可能有传承关系。永乐帝则以完善礼制为名补益服制，《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三年冬十月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改更，即命颁之所司，永为仪式。’”^③永乐制玄衣饰八种章纹，这一“礼制”依据可能来自唐宋，唐代玄衣饰八章，宋代除宋初外玄衣皆饰八章，而且种类与永乐制相同。《旧唐书·舆服》：“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④《宋史·舆服》：“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⑤嘉靖帝则以当时的玄衣有悖礼制与祖制为名，将玄衣章纹恢复为六章，龙改回行龙，日、月两种章纹的尺寸也恢复为洪武时期的尺寸。此外，还将衣缩短，以达“衣不掩裳”^⑥。洪武帝、永乐帝和嘉靖帝制定或调整玄衣皆以恢复礼制为由，但其具体依据的“礼”则不尽相同。明太祖主要依据汉代经学家注疏的典籍，永乐帝在洪武礼制的基础上参照了唐宋礼制，而嘉靖帝则以既恢复洪武礼制又不逾古制为主，但是三朝皇帝改服制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重塑秩序，昭示政权的合法性。

① 赵克生《明代的藩王继续与庙制变革——以永乐、嘉靖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51页。

② 《尚书郑注》，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页。

③ 前揭《明太宗实录》卷四七，第724—7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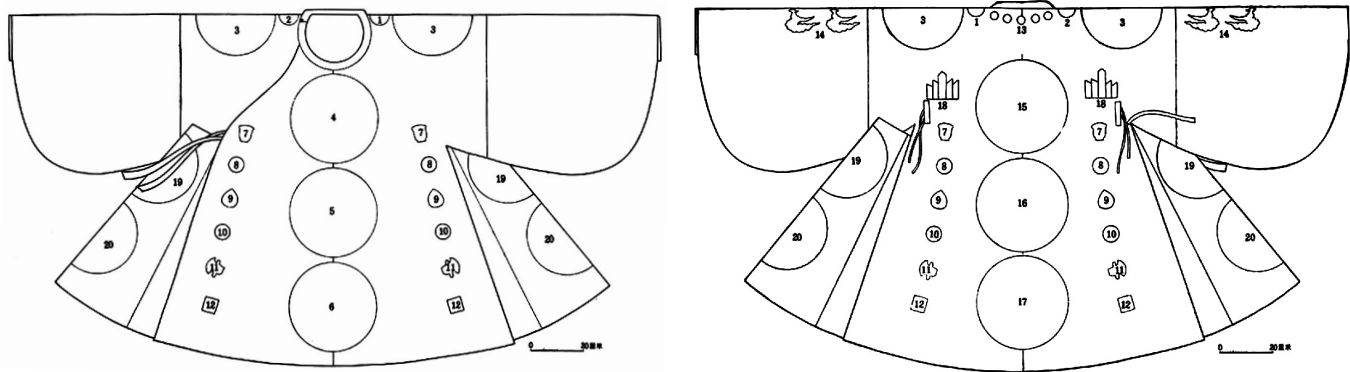
④ 《旧唐书》卷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936页。

⑤ 《宋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05页。

⑥ 《明世宗实录》卷一〇一，第2386—2389页。

〔图五〕定陵出土十二团龙十二章袞服前、后视样图及“华虫”

采自《定陵》，第82、85页



除此之外，章纹的位置变动可能还与展示性相关。洪武制玄衣中龙纹和“华虫”主要位于袖子正面，但在实际穿着时只要小臂弯曲端于体前，正面衣袖便会被隐藏，其上章纹自然无法示人，反而背面衣袖会被展现出来。所以，穿着洪武制玄衣时，龙纹和“华虫”应常会被隐藏，不能有效地起到“辨贵贱，明等威”的功能，而永乐制玄衣将章纹置于身后，即避免了这个问题，增强了章纹的展示功能。山、星辰两章移至后背或许也有此类原因，洪武制玄衣山、星辰位于肩部，与日、月、龙排布紧密，气势不足，且实际穿着时两枚章纹可能位于肩臂处，手臂下垂或摆动会使纹样显示不全、辨识困难，而背部既平又宽，将山、星辰置于此更有利于展示。嘉靖制玄衣恢复了洪武时期的章纹种类，但保留了永乐时期背面饰章纹的形式，极有可能是出于展示需要。



综上，在三种玄衣形制中，“华虫”位置变动的内因是皇帝需要重塑秩序、加强统治的正统性，变动的依据是恢复或完善“礼制”。但三朝皇帝所谓的“礼制”具体指向各不相同，导致“华虫”位置和造型不断变化。此外，强化章纹的展示功能或许也是其位置变动的客观原因之一。

2. 袞服

从图像和实物资料来看，明代还有一种袞服饰有“华虫”。定陵曾出土数件饰十二团龙纹和十二章纹的袍服，其中两件袍服在出土时附有“袞服”字样墨签，故而得知此类服饰名为“袞服”〔图五〕。袞服为盘领、大袖、窄袖口，双肩、前后、身侧饰十二团龙纹，双肩饰日、月，背部饰山、星辰，两袖饰“华虫”，前后裳皆饰宗彝、藻、火、粉米、黼、黻^{〔1〕}。此类服饰还见于南薰殿明代帝王坐像中^{〔2〕}，该系列坐像自英宗起开始穿着袞服，其形制与定陵出土的袞服基本相同〔图六〕。

然而检讨史料发现，虽然《大明会典》中载有“袞服”一词，但该词指代的并非定陵出土的袞服，实

〔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1—83页。

〔2〕 南薰殿明代帝王坐像图的功能之一是展挂在家庙之中供后世子孙祭拜，所以图像具有一定的写实性，其中的服饰资料应较为可信。

【图六】明代帝王坐像图

自左上至右下系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光宗、熹宗坐像
采自《南薰殿历代帝后图像》(上),台北故宫博物院,2020年,第228-270页



为“衮冕”服制中的“衮服”，相关内容见于《大明会典·冠服》“皇帝冕服”中“衮冕”：永乐三年定冕冠十有二旒，衮服十有二章。玄衣八章，纁裳四章。^①可见，《大明会典》中的“衮服”为上衣下裳，衣与裳共饰十二章纹，衣即为上文讨论的玄衣，而定陵中的衮服为袍，衣裳连属，二者在形制上有明显出入，并非同一种服饰。目前在文献中尚未发现定陵式衮服的相关描述，周锡保先生推测该服饰是“在常服的基础上加饰十二章纹等，用作次于衮冕服而高于常服的一种礼服”^②，但未说明原因。笔者同意周先生观点。首先，数幅南薰殿明代帝王坐像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从绘画形式、构图、坐具、面貌特征等方面，可以看出其绘制有一定的规范要求，服饰也应符合相关礼制。英宗之前皇帝皆着常服，即翼善冠、盘领窄袖黄袍，且前后胸及两肩饰团龙；英宗及其以后皇帝皆戴翼善冠、着衮服，说明常服与衮服之间有某种关联。而就形制来看，衮服确实是以常服为基础加饰了十二章纹。衮服颜色也为黄色，领也为盘领且肩

①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第197页。

②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386页。

胸饰团龙，甚至在英宗、宪宗时期仍为窄袖，孝宗时才发展至大袖。其次，十二章纹具有明确的礼制与等级属性，袞服饰此类章纹也表明其有礼制象征，但袞服与翼善冠组合使用而非冕冠，且“华虫”在每袖只饰两枚，较玄衣少用一枚，说明其等级应低于玄衣而高于常服。

〔图七〕宋代侯伯鷩冕中的“华虫”
采自《新定三礼图》，卷一



〔图八〕宋英宗后坐像中的翟纹
采自《南薰殿历代帝后图像》上，第112页



二 “华虫”在明代皇帝服饰上的造型变化

明代玄衣和袞服上的“华虫”造型基本相同，二者结合起来即可窥探此时“华虫”面貌与变化轨迹。明代“华虫”为短羽冠、红腹、蓝绿项、长尾、侧身、双脚一前一后站立，其造型有三次较为明显的变化。

1. 明代初期

明代初期“华虫”呈挺胸直立姿态，造型相对写实，尾羽有斑纹，末端逐渐变细并自然下垂〔见图一〕。该造型沿袭自宋代，与宋代《新定三礼图》中侯伯鷩冕像上的“华虫”基本一致，仅站姿稍有不同〔图七〕。此“华虫”与宋代皇后衾衣上的翟纹在造型、用色方面也基本一致^{〔1〕}，二者传承关系明确〔图八〕。此外，这种写实性的宋代“华虫”样式在明代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即便明孝宗之后“华虫”造型有了较大改变，《方氏墨谱》《三才图会》等典籍仍沿用宋代样式。其原因可能是宋代典籍、粉本在民间的流传度更高，而普通文人和刻工难以见到帝王服饰，只能汇集前代书籍中的图像。

2. 英宗和宪宗时期

英宗、宪宗时期“华虫”出现了变化，尾羽粗直且斑纹减淡。同时，翅膀紧贴躯干，身体姿态前倾，首、尾羽色较浅。此外，“华虫”的绘制手法细腻而写实，仿佛是真的锦鸡站在衣袖之上〔图九〕。“华虫”原本饰于深色且无地纹的玄衣之上，当其被置于袞服上时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一是袞服为黄色，与“华虫”首、尾撞色，所以此时期首、尾羽色变浅。二是袞服以抽象的云纹为地纹，其他纹样也极具装饰感，导致写实性的“华虫”在视觉上有突兀之感，这也为后世“华虫”造型之调整埋下伏笔。

3. 孝宗以后

孝宗以后“华虫”造型有明显变化。首先，“华虫”首、尾颜色变红，躯干色块之间的黄色装饰线变粗，以此解决与袞服撞色的问题；其次，“华虫”脚下添饰了云纹。在定陵出土的袞服和嘉靖制玄衣中，“华

〔1〕 宋代翟纹与“华虫”原型、造型相同，详见下节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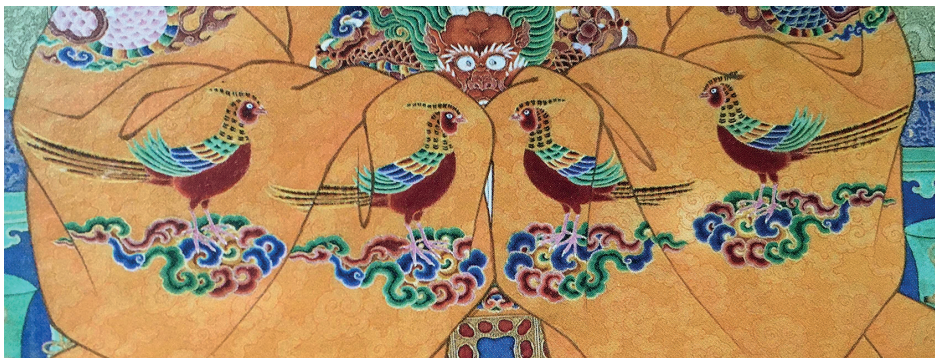
【图九】英宗和宪宗坐像中的“华虫”

采自前揭《南薰殿历代帝后图像》(上),第228、234页



【图十】孝宗坐像中的“华虫”

采自《南薰殿历代帝后图像》上,第240页



虫”脚下均饰云纹，可见这种改变始于孝宗时期。添饰的云纹与地纹相呼应，使“华虫”仿佛在腾云驾雾，增强了装饰感和神性，在视觉上与袞服更加融合，削弱了英宗时期的违和感；最后，“华虫”的尾羽又回归至明初状态，纤细且有斑纹，不同的是，受云纹狭长造型的限制，尾羽只能微微上翘〔图十〕。

由于资料有限，尚不能明确孝宗时期“华虫”造型为何有如此重大的变化。但是从明代帝王坐像来看，孝宗时期袞服形制有整体性的调整，更具有礼仪性。其袖由窄袖改为广袖，裳更为宽大，中单领部

改为黻领，藻、火、粉米等章纹结构更加工整。令人疑惑的是，若按宋代和明初的惯例，“华虫”与翟纹造型相近，如有变化应同步进行，但翟纹并无变化。南薰殿皇后像中孝恪皇后(嘉靖朝)、孝定皇后(隆庆朝)、孝端显皇后(万历朝)、孝元贞皇后(泰昌朝)及孝和皇后(泰昌朝)皆服翟衣^{〔1〕}，其翟纹与明初翟纹相近，并未同“华虫”一起增饰云纹，或许孝宗朝改动“华虫”是有意与翟纹进行区分。此外，孝宗生母身份卑微，本为宫女，且其六岁之前被宫人秘藏未获皇子身份，因而其皇位正统性小有“瑕疵”，孝宗或许也寄希望于通过调整袞服形制强化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上述内容仅为推论，确切原因仍有待新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孝宗至熹宗时期“华虫”整体变化不大，仅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总而观之，明代皇帝服饰上的“华虫”有三次明显变化。明代初期“华虫”造型写实，与自然界中的锦鸡形象比较接近；英宗和宪宗时期尾羽近似喜鹊，绘制手法写实，但与袞服的结合有突兀之感；孝宗以后“华虫”脚下添饰云纹，身上装饰线变粗，尾羽造型回归至明初形态，突兀感有所削弱。此后“华虫”造型虽仍有改动但整体变化却不大。

〔1〕 翟衣原称为“袞衣”，永乐三年时改称为“翟衣”，自周代起为皇后礼服之一，其上饰有翟纹。《大明会典》：“洪武三年定……服袞衣，深青为质、画翟赤质五色十二等，……永乐三年定……翟衣，深青为质，织翟文十有二等，间以小轮花。”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第197页。

三 服饰上的“华虫”原型追溯与流变

明代“华虫”原型为红腹锦鸡〔图十一〕，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然则，“华虫”最初的原型并非红腹锦鸡，而是经历了环颈雉——白腹锦鸡——红腹锦鸡这一演变过程。此外，早期“华虫”与“翟纹”的原型并不相同，但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混淆，最终变成同一种雉鸟。由于汉代以前的“华虫”资料较为稀少，且无法确定先秦时期服饰上是否使用“华虫”，所以本文对汉代以前的“华虫”不作讨论。

在我国早期典籍中，十二章纹中的“华虫”又名“鷩”“鷩鷩”，是一种身有五彩的雉鸟。东汉郑玄注《周礼·司服》：“华虫，五色之虫……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画以雉，谓华虫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1〕}另一位东汉经学家刘熙《释名》亦释“鷩”云：“有鷩冕，鷩雉之慙恶者，山鸡是也。鷩，慙也。性急慙，不可生服，必自杀。故画其形于衣，以象人执耿介之节也。”^{〔2〕}鷩冕为冕服之一，君王“享先公、飨、射，则鷩冕”^{〔3〕}，此外伯侯也可服鷩冕，鷩冕上饰“华虫”以下七种章纹。由郑玄、刘熙二人所言可知，鷩冕饰雉鸟为“鷩”，“华虫”即“鷩”。又《说文解字》释“鷩：赤雉也”^{〔4〕}。因而，通过汉代典籍的记述可以确定此时鷩为羽有五彩的赤色雉鸟。

东晋时，郭璞《尔雅注释》对鷩的外形有进一步详细地描述：“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鲜明。”^{〔5〕}由此推知，“华虫”是一种有冠，背黄色，腹红色，项绿色的雉鸟。郭璞对《尔雅》中的动植物进行了注证，他认为鷩为“锦鸡”，白鷩即白腹锦鸡，赤鷩即红腹锦鸡^{〔6〕}，但并未写明判断依据，所以无法展开分析。而赵翰生在《“三翟”原型鸟蠹测》一文中也对“鷩”进行了考证，从鷩的体貌特征、习性和体

〔图十一〕红腹锦鸡

采自丹尼尔·吉罗·艾略特《野鸡雉科图鉴》，转引自《芙蓉锦鸡图》一个雉类杂交的故事》，《森林与人类》2017年第2期，第85页



〔1〕 前揭《大明会典》卷六〇，第197页。

〔2〕 (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7年，第155页。

〔3〕 《周礼注疏》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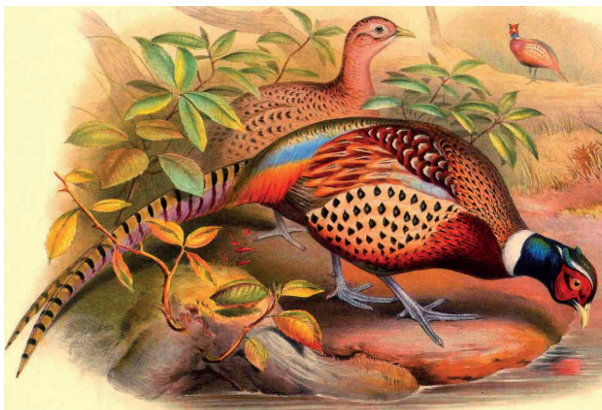
〔4〕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20年，第125页。

〔5〕 (晋)郭璞著，(宋)邢昺疏《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55页。

〔6〕 郭璞《尔雅注证》，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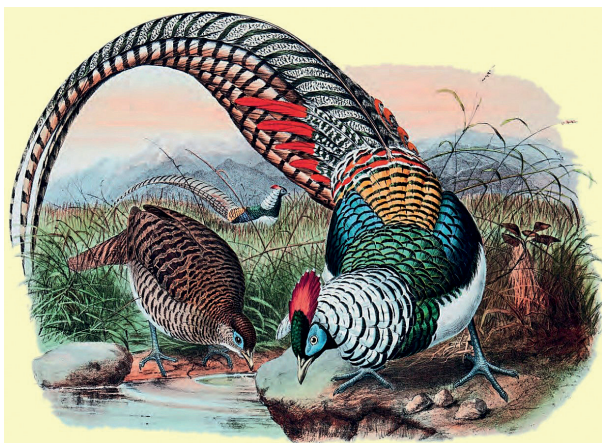
【图十二】环颈雉

采自[英]约翰·古尔德著,宋刚、贺鹏、赵敏编《亚洲鸟类(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411页



【图十三】白腹锦鸡

采自前揭丹尼尔·吉罗·艾略特《野鸡雉科图鉴》,第85页



型分析认为宋代以前的“鷩”原型为环颈雉[图十二]¹¹。

笔者认同赵翰生的观点,“环颈雉”又名“雉鸡”,雄性羽色华丽,头顶呈青铜褐色,有耳羽且能耸立起,颈部有绿色或紫色金属反光,下方有一白色颈环(部分品种无白色颈环)。上背部羽毛具“V”形黑纹且外缘有浅黄色宽边,下背部中央羽毛有黄、黑、深蓝相间的横斑。膺呈铜红色,有金属反光¹²。早在新石器时期环颈雉就已进入古人视野,成为人们的食物或祭品。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陶罐中曾出土两具完整的雉骨¹³,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也出土过环颈雉骨骸。此外,马王堆一号汉墓也出土过环颈雉遗骸¹⁴,可见古人对环颈雉并不陌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对“华虫”记载较少,并无明确的原型线索。如上节所述,“华虫”又被称为“鷩”,北魏时鷩与翠为同一品种雉鸟,但尚不能确定原型。《仓颉解诂》¹⁵曰:“駿驥,鷩,即翠翟,山鸡之属,尾彩鲜明。”¹⁶“翠”是一种饰于皇后“祔衣”上的翟鸟,《周礼》称皇后有“六服”:“祔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祿)衣。郑玄注:狄,当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翟……王后之服,刻缯为之形而采画之,缀于衣以为文章。祔衣画翠者,揄翟画摇者,阙翟刻而不画,此三者皆祭服。”¹⁷可见东汉时翠是一种身体以白色为主,兼备彩色羽毛的雉鸟。赵翰生根据多则文献考证出“翠”即白腹锦鸡[图十三],此观点很有说服力¹⁸。然而由于《仓颉解诂》大部分内容已佚,在其

11 赵翰生认为鷩即皇后阙翟中的翟纹,并在该部分论述了鷩的原型为环颈雉,虽然阙翟的翟纹是否为鷩还有待商榷,但是作者对鷩原型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赵翰生《“三翟”原型鸟蠹测》,《服饰导刊》2019年第1期,第5—7页。

12 郑作新《中国鸟类动物志·鸟纲》第四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64—165页。

13 邓惠、袁靖、宋国定、王昌燧、江田真毅《中国古代家鸡的再探讨》,《考古》2013年第6期,第86—90页。

14 湖南农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65页。

15 《仓颉解诂》最早著录于《齐民要术》,《齐民要术》于北魏末年成书,所以《仓颉解诂》至晚于北魏末年就已完成。

16 《通典》卷五七,中华书局,1992年,第1612页。“鷩”又名“駿驥”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记载,《说文解字》:释“駿”:“駿驥,鷩也。从鸟,夂声。”释“驥”:“駿驥也。”但“鷩,即翠翟”在《仓颉解诂》以前的典籍中并无记载。

17 前揭《周礼注疏》卷八,第2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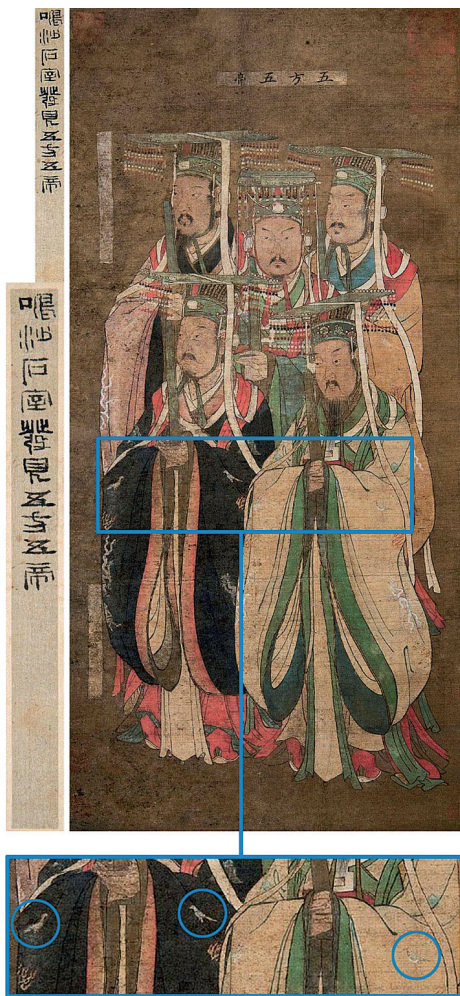
18 前揭赵翰生《“三翟”原型鸟蠹测》,第2—5页。

他北魏文献中也查不到鷩和翬的解释，所以根据《仓颉解诂》的记载仅能确定北魏时鷩与翬是同一品种的雉鸟，即“华虫”与翬是同一品种的雉鸟，但无法确定二者的具体原型。由于北魏以前鷩为环颈雉，翬为白腹锦鸡，《仓颉解诂》中鷩与翬有可能是环颈雉，也有可能是白腹锦鸡。

唐代沿袭北魏说法，“华虫”与翬为同品种雉鸟，但仍不能确定其原型。唐代“华虫”也称为“鷩翟”，《通典》载：“鷩翟谓华虫也”，此前还引《仓颉解诂》“鷩，即翬翟”之言，所以推断唐代“华虫”与翬应为同一品种雉鸟。直至五代，才可以确定“华虫”与翬的原型为白腹锦鸡。在敦煌沙洲龙兴寺旧藏的五代绢画《五方五帝像》〔图十四〕中可见“华虫”形象¹⁾。“华虫”饰于大帝衣袖，腹部为白色，首尾颜色较深，与汉晋文献中的“华虫”体征迥异。该“华虫”似为白腹锦鸡，雄性的白腹锦鸡头顶、项和背为蓝绿色，腹部为白色，后颈和长尾有黑白相间的斑纹，符合《五方五帝像》中的“华虫”形象。所以，五代时期“华虫”的原型极有可能已经变为白腹锦鸡。而据赵翰生的研究，宋代以前翬的原型为白腹锦鸡²⁾，故推测五代时期“华虫”与翬原型相同，皆为白腹锦鸡。

宋代，“华虫”与翬的原型再次出现变化，同时变为红腹锦鸡，并明确指出皇帝服饰中的“华虫”等同于后妃服饰中的“翟”。陈祥道《礼书》曰：“华虫，翟也，翟不特施于王服，而后之车服亦有焉，所谓衽翟、揄翟、阙翟、重翟、厌翟是也，不特后之车服，而舞与丧礼亦用焉。”³⁾而从宋代的皇后像看，翟鸟黄首、长尾、背部有翠色，其原型为红腹锦鸡〔见图八〕，故而宋代“华虫”原型为亦为红腹锦鸡。此外，宋代皇后衽衣上雉的名称和质色也有变化。此前称衽衣上的雉称为“翬”，宋代则改称“翟”且质色变为“赤质”，与红腹锦鸡羽色相吻合。另外，在宋人撰写的《新唐书》中，翬翟的质色也变成了“赤质”⁴⁾，而唐代《通典》与后晋《旧唐书》中的翬翟仍为“素质”〔表一〕，可知宋代人不仅想改变翬的原型，还意图通过编修正史合法化这种改变。

〔图十四〕五代《五方五帝像》(局部)
收录于《大风堂名迹·第四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



1) 该文献资料来源于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孙先生曾提及《五方五帝图》上有华虫形象，但未对华虫原型进行论述。前揭孙机《中国古代舆服论丛》，第384页。

2) 郑玄解释衽衣上饰翬，翬生活在伊水和洛水以南，即洛阳以南，白色，身有五彩羽毛，与白腹锦鸡特征吻合。其他论证参见前揭赵翰生《“三翟”原型鸟蠹测》，第2—5页。

3) 《礼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4) 《宋史·舆服志》：“后妃之服。一曰衽衣，二曰朱衣……衽之衣，深青织成，翟文赤质，五色十二等。”《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06页。

[表一] 皇后衽衣所饰雉鸟名称与质色

朝代	典籍	撰写时间	名称	雉鸟名称	质色
周	郑玄注《周礼》	东汉	衽衣	翠	素质
隋	《隋书》	唐	衽衣	翠翟	素质
唐	《通典》	唐	衽衣	翠翟	素质
唐	《旧唐书》	后晋	衽衣	翠翟	素质
唐	《新唐书》	宋	衽衣	翠翟	赤质
宋	《宋史》	元	衽衣	翟	赤质
明	《大明会典》	明洪武三年	衽衣	翟	赤质
		明永乐三年	翟衣	翟	——

宋代，“华虫”原型由白腹锦鸡变为红腹锦鸡，可能与宋自命为“火德”，崇尚赤色有关。王朝更迭之时，开国君主往往会为王朝树立新的德运和服色，如周为火德尚赤、秦为水德尚黑，以此强化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宋代为后周后继朝代，后周为木德，木生火，运膺火德，故宋为火德尚赤。《宋史·历律志》：“国初，有司上言：‘国家受禅于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仍请以戌日。’诏从之。”¹¹因而，宋代帝王以红色为常服服色之一、改车舆为赤色、用赤土刷染殿宇，尽为尚赤的依据¹²。“华虫”原型的改变亦可能与此相关，红腹锦鸡的喉、膺和腹皆为赤红色，而白腹锦鸡仅冠羽和背羽里层为红色，相较于前者红羽面积骤减，所以红腹锦鸡更符合宋代尚赤的观念。宋代以降“华虫”的原型没有改变，一直为红腹锦鸡。

综上所述，汉晋时明确“华虫”即鹭，原型为环颈雉。北魏时“华虫”与翠变为同品种雉鸟但无法确定原型，这一情况沿袭至唐代，直至五代才能确定二者原型为白腹锦鸡。宋代“华虫”原型又变为红腹锦鸡，并一直延续至明清。

四 “华虫”的涵义演变

“华虫”涵义主要有“取其文”和“取耿介”两种说法，其中以“取其文”为主流，但两种说法此消彼长，实则是一个知识生成的过程。

汉代关于“华虫”涵义的记载较少，郑玄、孔安国虽然对“华虫”有注解，但基本以外形描述为主¹³，并未明确表达其内在涵义，仅有刘熙对鹭进行了涵义解读。如上节所述，刘熙在《释名》中言鹭因其性格刚烈，故饰于服饰之上以象征人有耿介之节¹⁴。此时鹭即“华虫”，故可知汉代时“华虫”有耿介之意。

发展至南朝梁，崔灵恩拓展了“华虫”取其文的涵义，其《三礼义宗》云：“华虫者，画作鹭雉之形，有文饰，故谓之华虫也。象其身被五的(色)，有炳蔚之文，似王者体合五常，又兼文明之性。”¹⁵“五色”一

〈1〉 《宋史》卷七〇，第196页。相关研究亦可参见陈彦青《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 许哲娜《五德服色符号与改易服色制度的日常实践》，《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9年第2期，第12—14页。

〈3〉 郑玄注《周礼》言：“华虫，五色之虫。”孔安国《尚书正义》言：“华象草，华虫雉也。”二人皆言“华虫”羽色丰富、华丽。

〈4〉 前揭《释名疏证补》，第155页。

〈5〉 《大唐郊祀录》引崔灵恩《三礼义宗》，《大唐郊祀录》卷三，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49页。

般指赤、青、黄、白、黑¹¹；“五常”指仁、义、礼、智、信¹²；“文明”应指有文采懂礼仪，古语“文”既可指纹理，即“炳蔚之文”，也可指文采、文章、才华，即“文明”，此处应为一语双关。古人善以自然现象、生物特征附会伦理观念，崔灵恩沿用郑玄等人“华虫”身有五色的特征，并将其与“五常”相比附，以此喻示王者合乎“五常”、有文明之德。

隋代，顾彪综合了前人的“取其文”和“取耿介”两种说法，并且认为“华”和“虫”分别为两种章纹。此内容被收录于《尚书正义》，孔颖达疏：“顾氏取先儒等说，以为日月星取其照临，山取能兴云雨，龙取变化无方，华取文章，雉取耿介。”¹³

唐代，“华虫”取耿介之意的说法式微，取其文成为主流。唐人贾公彦疏《周礼》：“华虫取其文理。”¹⁴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华虫即鷩雉，雉有文章，表王者有文章之德也。”¹⁵此处“文章”即“文理”“文采”，亦为一语双关。唐人虽然采用了“华虫”取其文的说法，但剔除了崔灵恩的“五常”之说，其原因在于崔灵恩喜用阴阳五行说解经，其中就包含五行五色，但“往往牵强附会，不切经旨，故孔颖达、王引之等多非其说”¹⁶。此外，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中也曾提及“华虫”，但他似乎认为“华虫”与鷩是两种不同的雉鸟。其言十二章纹时说：“华虫者雉也，身被五彩，象圣王体兼文明也”¹⁷；言鷩冕时说：“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贤才，能守耿介之节也。”¹⁸所以在杨炯看来，“华虫”涵义为象王有文章之德，沿袭自崔灵恩、孔颖达等人，而鷩取耿介之意，沿袭自刘熙之说。自此“华虫”的两种释义基本泾渭分明，很少出现“华虫”既取文章又取耿介之节的情况。

宋代以降，基本因循“华虫”取其文之意。欧阳修等撰《太常因革礼》则直接引用崔灵恩之言，此外，陈经、胡士行、蔡沈、金履祥等人在其著作《尚书详解》《尚书详解》《书经集传》《书经注》中也言及“华虫”涵义为取其文。而耿介之说在宋代鲜有提及，宋人王昭禹甚至在解释“鷩冕”时也采用了文章之说，即《周礼详解》：“鷩冕，自华虫而下，华虫即雉也，以其色文明礼之象也。”¹⁹元明时期，多数文人亦认同“华虫”涵义为取其文，朱祖义《尚书句解》、许谦《读论语丛说》、胡广《诗经世本古义》、丘濬《大学衍义补》等典籍，或自述或引用皆释义“华虫”为取其文。不过，“华虫”取耿介之节的说法并未完全消失。宋人邢昺疏《孝

11 周跃西《略论五色审美观在汉代的发展》，《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第73—78页；“五色”与服饰关系亦可参见彭林《礼治背景下的先秦服饰文化》，《艺术设计研究》2021年第1期，第48—49页。

12 韩星《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4期，第24—29页。

13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页。

14 前揭《周礼注疏》，第793页。

15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108页。

16 焦桂美《崔灵恩的经学成就及其经学史意义》，《管子学刊》2007年第4期，第120页。

17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924页。

18 前揭《全唐文》，第1924页。

19 (宋)王昭禹《周礼详解》卷一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经》时仍言：“华虫谓雉，取耿介，”¹元人梁益《诗传旁通》和明人吕维祺《孝经大全》中也皆引用此言。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华虫”涵义早期以耿介为主，南朝时崔灵恩赋予其象征文明之性的内涵，唐代以降“取其文”的说法蔚然成风，“取耿介”式微但并未消失。那么，为何“取其文”会取代耿介之说，成为认同度较高的“华虫”涵义呢？十二章纹经由后人释义、建构，其每一种章纹都具有象征性，映射了不同的帝王德行。当“华虫”取其文时象征王有文章、文明、文采之德，如孔颖达所言：“华虫象于礼乐文章，以礼乐文章润于万物。”²而“耿介”则常用于形容士、公等臣子刚正不阿，鲜见形容君王，如“士执雉……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等³。因此，相较于耿介之说“取其文”更符合十二章纹的释义逻辑和君王德行，因为十二章纹主要用于君王的服饰，这很可能是“取其文”逐渐成为“华虫”主流涵义的原因。

五 结语

纵观“华虫”的原型和象征涵义，二者的发展历程是具有一定的契合性的。东晋前“华虫”的原型可能为环颈雉，涵义则取其耿介。而后，南朝人崔灵恩认为“华虫”有炳蔚之文，象征帝王有文明之性，这一理念在唐代成为主流之说并延续至明清。原型方面，北魏至唐代“华虫”与翬原型混淆，变为同一品种雉鸟但无法确定具体原型。直至五代才能确定“华虫”与翬皆为白腹锦鸡，宋代二者原型又皆变为红腹锦鸡，并延续至明清。就羽色而言，无论是白腹锦鸡还是红腹锦鸡都比环颈雉艳丽，所以也更加符合“华虫”取其文的说法。

明代，“华虫”的原型和涵义虽然变化不大，但在帝王服饰上的造型运用并非始终如一。明代“华虫”主要饰于皇帝玄衣和袞服，皆饰于袖。洪武、永乐和嘉靖三朝皆调整过玄衣样式，“华虫”的位置、数量也随之变化，洪武年间玄衣每袖正面下端饰一枚“华虫”，永乐以后移至袖背面且增至每袖三枚。这三次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帝王以恢复礼制为由，通过服制改革重塑秩序，昭示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而袞服则始服于明英宗，每袖背面饰两枚“华虫”，其位置和数量始终没有变化。在造型方面，初期较为写实，基本沿袭了宋代样式，具有明显的红腹锦鸡特征，英宗朝“华虫”尾羽变直，与袞服有违和感。直至孝宗时期，“华虫”造型有了较大改变，装饰性增强，脚下加饰云纹，增强其神性，整体风格与其它章纹更加贴合，此后“华虫”虽有微调但并无大变。

综上，博物学视野下探析明代皇帝服饰上的“华虫”，既能辨析物种源流，又能窥见其涵义变化。

[作者单位：杨妍均，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研究》编辑部；陈芳，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2〉 前揭《春秋左传正义》，第2108页。

〈3〉 前揭《周礼注疏》，第681页。